化民族屈辱为爱国力量

——评介《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江　陵

李文海教授和匡继光同志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以下简称《书系》)，新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在运用民族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传统领域内所凸现的一批新作。其显著特色首先在于，编者别具慧眼地选择了一个似乎已被人们熟视无睹、却又需要进行深入细致了解的历史课题——不平等条约，而此课题一经编者和作者巧妙有心地犁掘，便翻然焕发出一种强烈的激动人心的爱国力量。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关系民族未来的不朽伟业。它借助于本民族无限丰富的历史宝藏是必要而必然的。这种借助，既要张扬民族辉煌的过去，也要诉诸于民族屈辱和惨痛的往事。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还更具有教育感染力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越来越清楚深刻地意识到，近百年来中国饱经忧患和苦难的历史，已辩证地成为我们古老民族的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十分清楚，此中道理非常重要，所以此种事业值得反复去做、历久常新。当然这种反复，不是那种毫无意义的简单重复，而是要求每一次反复都有新的突破。可这在此块多经开垦、营植有年的领地里，已然不是一件易事。

《书系》的编者和作者们能取得突破性成绩的一个前提，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首先在于他们高明的拟题。他们有意识地抓住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一系列象征性事物——不平等条约，首次将其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认识对象，分十本书将其中 13 个较为重要的条约，加以专门的透视和记述，试图用血泪凝成的历史事实，去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服务于渴望爱国激情的现代化事业，显示出史学工作者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时眼光，也表明了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命运有较为深邃的理解。

，在风雨如晦的近代岁月，帝国主义列强于各个时期，采用军事威逼、政治讹诈和经济施压等种种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他们从中国掠夺了大片膏腴的土地，获得了巨额的赔款，攫取了以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在华侨民管理权，以协定关税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特权，以及在华驻军、控制海关和自由传教等各个方面的特权，从而使中国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成为这一苦难与屈辱带血的标志、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所犯罪行无可底赖的铁证，而且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民族命运的一面聚焦镜。正如李文海教授在《书系》的总序中所指出的那样：“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倾力揭示这些不平等条约及其所蕴含的历史内容，将其化作催人奋起的爱国力量，便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

以近代中华民族屈辱苦难的历史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任何其它爱国主义教育形式一样，最忌讳那种抽象和空洞的说教式论述。事实证明，这样的教育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作为一套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意图的丛书，《书系》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是它们在记述不平等条约的

时候，相当具体、形象、生动和通俗，具有较强的历史感化力。总的说来，这是别的近代史著的有关反映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书系》最让我欣赏的一点。

不言而喻，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可能通过正常交往，从清王朝手中轻而易举地夺走那么多的特权，而清王朝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将关系国运的应有主权慷慨的拱手让人。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实际上都无一例外地晃动着帝国主义分子们猖狂无耻的张张嘴脸，显现出满清官员楚楚可怜，软弱可欺而又令人可憎可恶的种种态势，同时也蕴含着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淋漓的历史事实。《书系》的编者作者深悉于此。他们在记述条约签订前后和谈判经过时，总是尽量地去发掘和展示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行为，对话和心理活动，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情境。阅读它们，就仿佛在观历史剧，能看到活灵活现的场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在谈到中法《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时，作者就生动地记述了法国代表无理而又无赖的表演：他们利用当时英法战舰进入天津，导致粮价暴涨、清朝官员恐慌之余希望他们尽快撤军的心理，大耍流氓手段。事后他们不无自我吹嘘的写道："每到我们要求什么东西时，中国方面总是回答说：'好吧！那么你们离开总可以了吧！'而我们则给他们当头一盆冷水：'还不走呢！，"又如中日《马关条约》签定时，李鸿章一开始觉得条款实在太苛，表示难以接受，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就不断威胁他，"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这样北京之危，实不堪设想。"在日方的种种威逼利诱下，李鸿章被迫接受了全部条款，只是考虑到限期一月交出台湾，时间上过于仓促，因而委婉地要求日方宽限一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而伊藤则厚颜无耻地回答道："尚未下咽，饥甚！"象这样通过具体细节的描写记述，不仅可以使条约内容活了起来，有助于读者对其留下深刻印象，加深理解，也能使他们从中更加真实、深切地感受到当时中华民族的可悲命运。而这，仅仅通过那些枯燥的条款内容和赔款数字的陈述，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此外，在注情秉笔这一点上，《书系》也有突出的表现，具备了这类著述格外需要的情感贯注的特点。《书系》的每册书，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浓烈的爱国激情，使读者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卑鄙行径的愤然谴责，对清王朝庸吏可欺的无情鞭笞和辛辣嘲讽，以及对中国人民不屈的反抗精神的深情赞颂，读来令人心如潮涌，凝神沉思。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编者还是作者都是十分自觉的。编者在《书系》总序中，曾就历史理论中"理性"与"感情"的关系作过简短而透辟的阐明，指出："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是要经受历史实践的检验。"正是这种明达的理论认识，使得《书系》的写作，将理性判断和感情贯注较好地统一了起来。

《书系》还有一个特点或许应当强调，那就是学术性和知识性的统一。《书系》并非只是一般性的传授历史知识的通俗读物，而是经过了一番学术性的探研工作。因为其中不少谈判签约的历史过程都不是清晰现成的、需要作者去爬梳资料、理清脉络，分析判断。实际上，首次将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集中、系统、具体地加以探讨和反映，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这也正是《书系》的可贵之点，和它在类似的一般读物中具备较高品位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它对从事有关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也具有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书系》深刻表明，爱国这份神圣的情感力量的源泉，就蕴藏民族深厚的历史之中，关键在于人们如何继续开掘和引导。